

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精神风范的真实写照。在这个堂屋，他曾接待过陈独秀、邓中夏、梁漱溟、章士钊等众多革命同志和友人。

来到西厢房，这里曾经是党组织早期的活动会议室。据解说员介绍，在陶然亭慈悲庵被定为党组织固定活动场所前，大部分党内会议和活动都在这间会议室举行。屋内的一架旧风琴引起不少参观者的注意，讲解员的娓娓道来，将人们带回到那段风雷激荡的历史岁月。

当年，李大钊在宣武门内头发胡同旧货市场买回了这架旧风琴，安放在书房的西墙下面。有了这架风琴，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李大钊便教子女唱《国际歌》等革命歌曲。为了不被警察和暗探听到，他们的歌声总是很低沉，只有在刮风下雨天，借着风雨声掩盖，家中的歌声才会比较嘹亮。

南院内，则是“播火者——李大钊革命思想与实践”专题展。展览重点展示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及伟大贡献。

在此居住期间，李大钊以极高的热情研究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社团，创建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推动建立全国性党组织，领导北方工人运动，积极促成国共合作，成为20世纪初中国革命的“播火者”。

追忆先驱守望初心

纵观党史，红色报刊具有重要作用。在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20号，一座百余平方米看似不起眼的小院子，便是《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1917年初，陈独秀被蔡元培聘请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随即北上居住于此，《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到这里。《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后，北京大学新派人物加入《新青年》撰稿行列，实现了《新青年》杂志与北京大学“一刊一校”的结合。从1918年1月出版的第4卷第1号起，《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鲁迅等一批思想者和文化先驱在《新青年》上猛烈发声。一时间，《新青年》的发行量从创刊最初的1000份增加到最高峰的1.6万册，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

1923年6月，《新青年》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理论刊物，直到1926年7月停刊。从创刊到停刊，它见证了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的历史过程，在党的创建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位于西城区魏染胡同的京报馆旧址，是著名报人邵飘萍所创的

《京报》的办公地点。报馆楼门上方邵飘萍亲笔所题的“京报馆”3个大字见证了一位秘密共产党员用生命追求光明和真理的奋斗足迹。

“铁肩辣手”，一进京报馆旧址，就能看见4个醒目的大字，这是邵飘萍一生的信念和实践。1918年，32岁的邵飘萍辞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一职，决心自己办报，以笔为枪，宣传真理。1918年10月，邵飘萍创办的《京报》诞生。邵飘萍还亲手写下“铁肩辣手”4个大字，悬挂在编辑部的墙上，与报社同人共勉。

由于《京报》的新闻报道敢于针砭时弊、伸张正义，很快便成为当时北京最有声望和影响的报纸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邵飘萍以《京报》为宣传阵地，大量刊文，揭露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之流的卖国行径，并把矛头指向腐败无能的军阀政府。为此，《京报》曾被反动军阀查封并短暂停刊。

1920年复刊后，邵飘萍借助记者的身份，从北洋政府、东交民巷外交团、路透社、电讯社等方面，为中国共产党获取大量重要信息。

《京报》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舆论阵地。在北京共产党组织的关心培育下，1925年春，由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邵飘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特殊的秘密共产党员。

时光荏苒，今天的京报馆将一份进步报纸的坎坷命运、一个传奇报人的人生和一段党领导下红色报刊的奋斗发展史，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背景下，使观众深刻领悟，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新闻事业才能蓬勃发展壮大。

采访结束，各党刊社记者纷纷表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赓续精神血脉，勇担历史使命，永葆人民情怀，不断展现新气象，以优异成绩为党的光辉史册增添新的光彩。

本刊记者 杨梅 袁海毅 谭宗慧



北京李大钊故居一角 袁海毅